

中国学校的原理

——学校教的是知识、技能、能力与思维观念

徐林林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兴教办学,学校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变迁而变迁。中国官、民办学有3-5000年的历史,在公元1999年以前,中国学校是贵族与精英教育,“高校扩招”后,才扩展到平民阶层,形成普通与职业教育双轨互通并轨学制。随着中国社会由“工业化”跃升至“智能化”时代,学校需要由知识的传授,转向能力和修养的提高,学校就是让生理学上的自然人“成人、成才”。知识+技能=能力,有能力的人就是“成才”;能力+修养=公民,成才的人若有较高品质,才算“成人”。知识+技能+修养=公民,这是学校教育的天职。公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政治修养=接班人,这是当代政府办学,赋予学校的政治任务。同时,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修养上也需要分层的,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从其言行中能看出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再才是一个有知识、有技能、有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接班人;他们中的精英,立志充当民族中流砥柱者,才能成为一个终生为人民奉献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学校教育;宏大叙事;能力技能;思维观念

学校,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机构。

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多种教育活动,本文意指的教育,是指狭义层面的教育活动,专指21世纪中国各级政府举办或由政府批准设置的国民教育机构(不包括各级党委、政府设置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以及军事院校)。故而,直接把狭义的教育称之为(国民教育)学校。

原理,即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它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概括得出的总结性文字表述,生活中,通常也把它称之为“常理”与“常识”。它指导实践,又受实践检验。

一、中国3000年教育的宏大叙事

在中国,政府办学,教化于民,有相当长的历史。据《学记》①记载:“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yuè‘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意即: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首先要设学施教。《尚书·兑命》篇中说:“始终要以设学施教为主”,就是谈的这个道理。而孔子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时年34岁开始接收弟子办私立学校[1]。据古籍《孟子》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里的校、序、庠都是指小学的意思。由此可见,中国的学校史在3000-5000年以上。

中国仿效西方举办新式学堂,始于清末洋务运动(1861-1894)的1862年,第一所新办学校是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人员的“同文馆”[2],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同文馆)。如果把人类到目前为止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按劳动模式分解成狩猎、农牧、工业、智能四个时期,则中国教育呈现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家庭、部落狩猎时期。教育是一对一、人传人,主要内容是劳动、生活技能口授模式,因教育与劳动、生活的需要,文字开始产生,史称“仓颉造字,结绳记事”。大概在史前期至夏朝,部分延至商朝初期。

第二种模式:由部落农牧文明跃升至帝国文明时期。开始有学

校组织,教育与文化共成长。由百家争鸣、秦统一、独尊儒术、造纸、印刷术产生、“程朱理学”与“明王心学”集儒学之大成过程。

第三种模式:现代教育的学校兴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议论、争论22年后的1862年北京“同文馆”设立,再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推广新学制(现代学制,定形于1902年的“癸卯学制”)止,共花去62年时间,才由古代教育转向现代教育模式。

洋务运动中,学习欧洲的“双轨教育”模式。到民国时期,开始学习美国的单轨制。新中国建立后,学习苏联的分支制模式,改革开放后,再次学习美国的教育模式[3],同时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

双轨制:英、法、德的学制是双轨制的典型代表。单轨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学制,其特点是所有学生无论出身,都在同一学校学习,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分支制(分支型学制):是20世纪上半叶由苏联建立的一种学制,这是一种介于双轨制和单轨制之间的特殊学制结构。从2019年开始,有中国特色的“普职互通的双轨融合学制”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

第四种模式:即中国目前的有中国特色的“职普互通的双轨融合学制”是向“智慧教育模式”过渡的起点。近四十年,中国的学制变化,就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性质的变迁(工业化)而改变。目前,中国教育学制系统2021年时点状态。

之所以称之为“第四种模式”,不是从形式上,普职间“互认、互通、相融”这种低维度的变革命名的。专科高职学校的设置,是教育对中国社会快速工业化应急反应。整个高等教育如何适应“智能社会”的到来,很难预测、设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教育适应中国社会变迁,必然是随着5G通讯技术在工业与教育领域应用的实现,而逐渐演化的(2020年疫情期间的网上教学,是上天安排的一次预演),决不是“普本转应用”、“高职专升本”这么简单,而是教与学的本质变化。

二、学校教的是知识、技能和能力

教师，学校之本。从夏朝至清代，直至 20 世纪末，中国教育都是贵族与精英教育，从 20 世纪最后一年（1999）高校扩招起，高等教育才真正扩展到普通民众阶层。其中，1978 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1.55%，1988 年 3.7%，1998 年 9.76%，2008 年 23.3%，2018 年 48.1%，2019 年达到 51.6%[4]。中国仅用 20 年时间，把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不足 10%，提高到 50%以上，实现了由精英高教转为普及型高教，达到发达国家高教普及标准[5]。

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结果的总和。能力，是完成一项任务或工作目标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能力，包括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联想力、模仿力、持续力、坚毅力、组织力、沟通力、领导力、创新力、学习力、号召力、适应力等，还包括性格、体力、口才等先天天赋，不是 100%后天学习带来的结果，它是个综合指标。技能，是运用知识和经验执行一项活动的规范方式或操作的标准方法。修养，是一定素质的人，通过自我素养和家庭、学校、社会教养，以及玩伴，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同伴相互影响中，而获得的品质特征。素质是与生俱来的生理特征与习惯，有遗传因素，它是人的生理固有特征在成长中养成的习惯与本来的性质（格），以及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通过以上讨论，“知识、技能和修养”三大块就是学校教学的内容。

三、学校搭建人的思维模式与框架

人类最早的陆上交流是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跨洲侵略战争是匈奴西进；最早的海上交流是郑和下西洋（80 年后才有欧洲大航海时代与发现美洲新大陆），海上亚欧贸易主要商品是瓷器和茶叶。近 500 年来，欧洲航海与工业技术领先人类社会，摧残全世界农耕（牧）文明，把人类负面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给全人类带来无尽的苦难，形成人类个体道德化、国家整体恶德化趋势，这种国家恶行至今仍然肆虐于人类社会。这种现象被西方称为“文明的冲突”[6]。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互不理解对方的现象的确存在。例如：

1、对国家统一与分裂观念不同。中国人自秦以来，两千多年以多民族大一统为上、分裂为下，欧洲却以不同民族分别立国为合理。

2、对待私欲与善念看法不同。中国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做人要有善心、善念、善言、善行，恶心、恶念、恶行必有恶报。西方人则认为：“人之初，性本私”，自私是人的本性，应该普遍尊重；人与人有情感、国与国没有情感，只有利益，只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3、对组织与个人关系认识不同。中国人以集体主义至上、个人利益为下。西方人则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权利都是个人让渡的结果。中国人以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甚至献出生命。

4、对群体与个人幸福观念不同。西方国家的人们认为自由就是幸福、人权才是保证、投票是手段；由政治正确极端化，直至个人权利贪欲膨胀、私欲泛滥。中国人认为不管是家庭、组织还是国家，团结就是力量，纷争就是虚弱，生命和生存权高于自由与人权；私欲有上限、有禁区，不可放纵、不可忽视；任何事物有度，过度则质变。

5、对国家与个体关系处理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认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权不得侵犯私域。中国人认为国家是保护人民整体利益而存在，重在抵抗外敌入侵、抗击自然灾害、预防疫病等，团结与组织人民形成国家力量，有国才有家，国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6、对整体与局部关系处理不同。中国人认为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而西方人则认为公共权力不得侵入私人空间，中央与地方权力是邦联关系，权力有分配，地方权力与联邦权力互不相关、互不干涉。

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落后于人类先进生产力，欧美占据了生产力至高点，其文化也垄断了人类的话语权。新中国七十年，由于“五四运动”的正当性与“儒家文化”的非正当性，共同制约，我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上存在批判性过度，继承性不足。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论）处于神圣地位，除毛泽东思想外，没有很好地与中华文化全面融通、贯通，只实现了“革命化”，没有实现“中国化”、“文化化”、“生活化”。致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还不及伊斯兰文明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大。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从小学到大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梯度传承问题。

总之，从小学到大学，要把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认知世界的思考框架传承下去，而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过去，政治化 5000 年和 70 年的新中国”，现代中国，是人民生活加国家建设共进的社会，伟人和英雄人物，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教育培养的人才，思想观念也应该分层，受教育者，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从其言行中能看出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再才是一个有知识、有技能、有素质的劳动者、建设者、接班人；他们中的精英，立志充当民族中流砥柱者，才能成为一个终生为人民奉献一切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1]王齐洲，关于孔子办学的几个基本问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2]王言法，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导师：于化民教授，2011-04-18。

[3]成有信，现代教育制度及其改革[J]，中国教育学刊，1991 年第 1 期 P59-63。

[4]别敦荣、易梦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标准、进程预测与路径选择[J]，教育研究，2021 年 42（02）。

[5]教育部，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2020 年 05 月 20 日。

[6]（美）塞缪尔·亨廷顿，翻译：周琪，文明的冲突[M]，新华出版社，2013 年 1 月 1 日。

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项目编号：21ZD154 名称：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教改课题（项目编号：2022JY111 名称：云端红色资源融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徐林林，女，（1980 年 6 月--），湖北黄冈人，哲学硕士，武汉设计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